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发展的路径选择

陆 益 龙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2)

摘 要: 2020 年,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中国乡村发展进入新时代。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为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形成,乡村发展需要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基础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需要置于现代化、城镇化的大背景、大趋势中加以考虑,并要结合中国乡村社会的现实,将"补短板"与高质量发展统一起来,把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有机融合起来,形成拉动新时代中国乡村发展的"两驾马车",在中国式农村现代化道路上稳步前进。

关键词: 乡村振兴;乡村发展;路径选择;中国式农村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C 912. 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21)04-0018-09

随着精准扶贫战略的顺利实施,中国的脱贫攻坚完成了历史性任务。2020 年如期实现了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乡村发展迈入新时代,迎来新机遇和新挑战。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时代,乡村发展将向何方?将选择什么样的路径去实现宏观战略设定的目标?乡村发展问题是农村社会学、发展社会学的重要议题,对发现、认识乡村发展规律,指导乡村振兴实践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已有关于中国乡村发展的调查经验基础上,结合制度分析的视角,探讨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乡村发展较为理想且有效的路径选择问题。

一、中国乡村发展进入新时代

按照国家"十三五"规划的脱贫攻坚战略目标,2020 年是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2020 年之后,乡村发展进入乡村振兴的新时代。之所以说中国乡村发展进入新时代,主要是基于四个层面的社会事实而作出的概括与判断:一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势;二是宏观制度安排的结果;三是乡村发展的社会现实;四是精准扶贫的微观实践。

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依然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经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之后,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得到较大幅度的提高。2020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7131 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3834 元(见图 1)。总体来看,居民的经济收入水平基本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意味着中国已迈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虽然经济收入的城乡差别依然较大,但乡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得以明显提高,且提升速度较快。

在新时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深化和推进,中国经济保持增长的趋势将会持续下去。① 经济发展向好、向稳的大势为巩固脱贫成果创造了有利条件,为乡村振兴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当人均收入水平在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乡村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也成为大势所趋。即便不均衡、不充分发展问

收稿日期: 2021-01-26
作者简介: 陆益龙,男,安徽枞阳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
基金项目: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农村社会学与乡村振兴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8XNLG09)的阶段成果。

① 林毅夫:《六问中国经济奇迹可否再续》,《领导文萃》2015 年第 8 期,第 25—28 页。

题可能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这些问题不会改变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和趋势。因此,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和发展理念的更新,乡村发展已开启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与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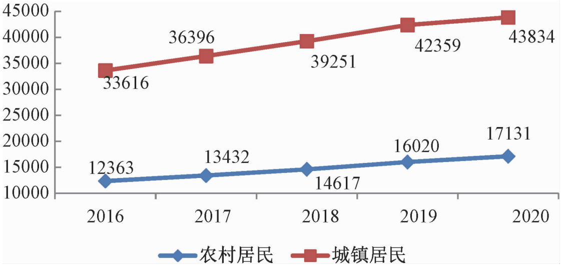

图 1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情况(单位: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年度数据,2021 年 6 月。

中国乡村发展新格局的出现也是由国家宏观制度安排带来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将农村扶贫开发作为一项长期系统工程稳步、扎实地推进。1986 年,国家成立专门扶贫工作机构,地方各级政府也成立了相应的扶贫工作部门,负责领导和开展本地扶贫开发事业。1994 年,国家实施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主要瞄准区域性贫困,重点开展贫困县的扶贫开发工作。到 2000 年底,农村贫困人口由 1985 年的 1.25 亿减少到 3000 万,农村贫困发生率由 14.3%降到 3%。可见,扶贫攻坚计划在农村减贫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进入 21 世纪,《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 年)》颁布,为新世纪农村减贫工作进行了宏观规划和制度安排,确立了综合性开发式扶贫的主导模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对农村扶贫工作进行了新的顶层设计,提出扶贫攻坚进入关键时期,要求到 2020 年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为实现全部脱贫目标,十九大进一步提出了精准扶贫的贫困治理机制,并形成了广泛动员、各方参与的精准扶贫行动体系。

从新制度主义理论视角看,国家宏观制度“不仅造就了引导和确定经济活动的激励与非激励系统,而且还决定了社会福利与收入分配的基础”①。反贫困的“中国奇迹”的出现,农村贫困人口的全部脱贫,既是国家政策向人民群众的庄严承诺,也是国家制度安排与实施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乡村发展新时代的到来,是国家宏观发展战略和制度安排的结果。

中国乡村发展新时代的到来也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从社会转型论的角度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已进入快速转型期,社会结构从传统农业社会快速向工业化社会转型。② 在此进程中,乡村社会也不可避免地发生大转型。转型之后的乡村已从费孝通所描述的“乡土社会”,③迈向“后乡土社会”。④当今乡村社会,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已不是“乡土社会”的“饥饿问题”,或者说,绝对贫困问题不是乡村发展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了,满足乡村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则成为乡村发展的新目标。

从乡村脱贫经验来看,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户主要通过生产积极性和自主性的提高,改善农业生产经营的效率,发挥多种经营的效益优势,快速摆脱了温饱问题的困扰。随着市场转型的全面推进,广大农户积极地参与到市场经济之中,通过“闯市场”机制从市场中分享到更多机会。⑤ 农民工向城镇流动,不仅提高了家庭收入水平,而且给乡村社会发展开创了新局面。对于大多数农户来说,他们的增收

---

①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7 页。

② 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探索: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 页。

③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6 页。

④ 陆益龙:《后乡土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第 16 页。

⑤ 陆益龙:《制度、市场与中国农村发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08 页。

渠道扩展了,不再局限于农业,而是可以通过劳动力的外出经营,在“大市场”中寻找到增收机会。从流动人口监测数据来看,目前农民工的平均月工资水平为 3200 元左右。如按此标准来推算,一般农户只要有一个劳动力外出打工,基本上就能保障该农户在现行贫困线上脱贫。这也就意味着,对于大多数农户来说,走出绝对贫困已成为现实,乡村发展迎来新任务。

经过精准扶贫战略的推进和实施,深度贫困地区的农村绝对贫困问题已得到整体性解决。2021年,现行标准下 9899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摆脱贫困状态,832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 8 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脱贫攻坚取得彪炳史册的成就。为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优先发展农业农村的战略部署,在此宏观背景下,中国乡村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二、乡村发展的路径选择面临新格局

乡村振兴新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乡村发展的形势与格局已发生变化。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乡村社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无论从发展目标与任务,还是从发展条件的角度看,乡村发展皆已发生重大转变。

首先,从乡村发展的总体目标来看,乡村振兴新时代对乡村发展提出了新的目标要求。随着乡村贫困人口的全部脱贫,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发展目标不再是解决贫困问题,全面脱贫与小康社会的建成已成为发展的新起点。在新时代,乡村发展总体上不再是以解决温饱问题或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要为主要目标,而是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目标。

中国乡村社会现代化进程,不同于西方发展社会学的现代化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单一路径。中国乡村社会现代化,所处的时代背景是现代化、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大环境,并不存在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而是面临如何在现代社会中谋求更为理想的发展。

中国乡村社会现代化也不同于依附理论所概括的边缘地区“依附性发展”。尽管在城镇化过程中,城乡差别依然存在,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中心作用较为明显,但是,伴随着发展总体水平的不断提高,乡村价值、乡村主体性的作用日益显现出来,乡村并非依附于中心而取得发展。

作为新时代乡村发展的总体目标,中国乡村社会现代化是一种新型的现代化,即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现代化。根本宗旨在于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增进人民群众的福祉。实现乡村居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目标,可选择的路径、方式、方法是多样的,并非只有现代取代传统、城市取代乡村的现代化单一模式。新型乡村社会现代化的核心意义在于广大人民群众真正过上美好的生活,在通过何种方法改善生活等方面,则有多种可能性、多种选择,因为中国乡村社会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特征,如果按照西方现代化理论来确立标准化、单一化的生活方式、文化价值观,那么,乡村社会现代化不仅会偏离中国实际,而且还可能付出牺牲社会与文化多样性的代价。

驱动中国乡村社会现代化的动力并不是依靠资本的积累和扩散,而是需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①也就是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农村改革和农村扶贫的历史经验中可以看到,乡村社会具有自身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能够走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富民之路。因而在新时代,乡村居民在国家制度的支持下,也会充分发挥出发展的能动性与创造性,实现乡村社会现代化的目标。

其次,从乡村发展的主要任务来看,新时代乡村发展的重点任务显然已发生转变。在乡村实现整体性脱贫后,乡村发展中的扶贫与反贫困其实并未终结,而是发生了转变。这一转变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乡村扶贫开发工作从脱贫攻坚向巩固脱贫成果的转变;二是乡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性质从应对性扶贫转向预防性治理;三是乡村扶贫开发工作机制从扶贫脱贫机制向均衡发展机制的转变。

进入新时代,虽然乡村绝对贫困人口已经全部脱贫,但这并不意味着贫困问题不再发生。脱贫攻坚

① 陆学艺:《中国农村现代化的道路》,《教学与研究》1995 年第 5 期,第 18—24 页。

不是一劳永逸的事,而是需要不断巩固成果,提高乡村社会反贫困的能力。特别是对于那些通过国家扶贫攻坚政策而摆脱贫困的乡村地区来说,依然存在一定程度的返贫风险,巩固脱贫成果显得尤为重要。乡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得以全部摘帽脱贫,这一发展成果是在强有力的脱贫攻坚行动支持下取得的。脆弱性地区和弱势群体仍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存在,为防止脱贫人口返贫以及乡村贫困再发生,反贫困工作仍是新时代乡村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只不过新时代反贫困工作重点和中心有所转移,亦即转向有效巩固已有的脱贫成果,并促进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有机衔接。

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一方面需要保障已有精准扶贫措施以新的形式持续跟进,避免因帮扶措施中断而导致脱贫的前功尽弃。另一方面,乡村发展要加强原先深度贫困地区和人口的内生发展能力,社会支持需重点放在"造血式"帮扶上,注重恢复并提升弱势人群自身的"造血功能"或发展能力。

乡村在未全面脱贫之前,扶贫开发工作属于应对性扶贫,扶贫工作需要应对贫困问题,要帮助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生活状态。在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之后,深度贫困地区和绝对贫困人口的贫困状态、贫困问题得到解决。乡村贫困问题的整体性解决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政策和实践密不可分,如果全部撤离帮扶措施,一些问题可能会复发。因此,有效巩固脱贫成果,必须采取预防性治理措施,通过扶持和促进发展有效防范贫困问题的产生。

预防性治理是指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建立和完善反贫困机制,其功能在于有效预防和应对各种形式贫困问题在较大范围内发生。与脱贫攻坚不同,预防性治理是人类社会反贫困或贫困治理的一种策略,主要是为了预防和应对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连片贫困与个体贫困成为范围较广的社会问题,对各种贫困问题加以及时有效解决。乡村预防性治理是新时代的反贫困工作主体方式和任务,也是精准扶贫战略的转变和更新。在预防性治理工作中,一方面维持和保证脱贫攻坚阶段的各项扶贫脱贫政策措施的一定连续性,对脱贫摘帽的贫困县、贫困村和贫困户,仍保持相关扶持政策的施行,以保证脱贫攻坚的政策措施能够持续发挥预防和支持功能,避免帮扶政策措施退出后,贫困问题在较大范围反复和再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仍须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关键帮扶政策和措施的延续与跟进,对精准扶贫阶段的一些强化措施须经科学评估后逐步谨慎退出。另一方面,要推进原有扶贫开发工作职能转变,将工作重点转向支持发展与防止返贫之上。为有效预防脱贫摘帽地区与脱贫人口的返贫,可通过"设立脱贫攻坚过渡期",①维持帮扶政策的总体稳定。通过建立预防性的监测和应对机制,针对脆弱性较大的脱贫地区和脱贫人口,提前采取积极有效的帮扶措施,防止贫困问题再发生。

在实现整体脱贫之后,乡村发展面临的中心任务是乡村振兴与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面对乡村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客观事实,采取积极的均衡发展措施,增强乡村特别是发展相对滞后地区的内生发展动能,降低脱贫地区和人口返贫风险以及相对贫困问题产生的风险,逐步缩小区域和地区间发展差距。

进入新时代,乡村发展条件已发生重大转变。随着决胜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乡村发展迎来新起点、新格局和新条件。新起点就是乡村社会实现整体性脱贫,实现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即不愁吃不愁穿,儿童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站在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和全面解决温饱问题的新起点,乡村社会需要向另一个更高目标迈进。

新格局是指乡村发展所处的大环境、大背景和大趋势。乡村发展路径的选择必须根据大环境而作出,新时代乡村发展的大环境虽然总体上没有大的改变,仍是费孝通所总结概括的"信息社会",即经历着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的"三级跳"②。但是,信息技术的更新和升级,特别是5G 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带来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在高度互联互通的信息社会,乡村

---

① 黄承伟:《中国特色减贫道路论纲》,《求索》2020 年第 4 期,第 91—98 页。

② 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85—399 页。

发展既面临着新的挑战,也有新的机遇。一方面,信息社会的需求变化对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产品供给、人才结构、制度创新等诸多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另一方面,信息社会的技术进步与更新为乡村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

新时代乡村发展是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推进的,在精准扶贫目标达成之后,“三农”工作的重心转向乡村振兴。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和实施,乡村社会在产业发展、生态环境、文化建设、基层治理和生活方式等方面,迎来了新的发展格局。

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发展是新时代乡村发展的大趋势。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对于乡村发展来说其实是并行不悖的关系,因为新型城镇化与传统意义上人口进城的城镇化不同,新型城镇化则是人、产业及生活方式的城镇化,有着多元的模式,①所确立的城乡关系是融合发展的关系,亦即城乡居民、城乡产业和城乡生活方式的融合发展。

进入新时代,乡村发展具有了新的条件。长期以来,“三农”工作实践已积累了丰富且行之有效的发展经验与机制,这些经验与机制主要包括在脱贫攻坚与精准扶贫阶段形成的城乡联动、东西部联动的发展机制。在实施精准扶贫政策的过程中,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东部支援西部、城市与乡村相互促进的协调联动机制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已有的经验和机制为新时代的乡村发展提供了新的外部条件,对提升乡村内生发展动力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总体来看,新时代的乡村需要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构建起新发展格局。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乡村发展既要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同时又要朝着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方向不断前进。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征程上,路径选择对于发展目标实现来说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三、“补短板”与乡村高质量发展相结合之路

在乡村振兴新时代,科学合理、正确地选择乡村发展路径尤为重要。为实现乡村发展新目标,发展路径的合理性与恰当性不仅可确保振兴实践方向的正确,而且有助于提升乡村发展的效率。

合理地选择乡村发展路径,必须科学、准确把握乡村社会的实际情况,充分地认识乡村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当前,乡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虽已全部脱贫,但不均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依然存在。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与此同时又必须面对乡村发展不均衡不充分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提是要补上乡村发展的“短板”。按照“短板效应”原理,如果不能补齐乡村发展中的“短板”,就难以达到发展的平衡,难以实现充分发展。面对不均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首先要找出制约乡村发展的“短板”。

从当前实际情况来看,制约乡村发展水平主要有三大“短板”: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和乡村教育。乡村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短板”。尽管从纵向比较的角度看,经过新农村建设和精准扶贫的努力,当前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条件已经得到明显地改善。然而,相对于现代化发展的总体水平而言,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仍相对薄弱。特别是在满足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方面,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仍需要重点加强(如表 1 所示)。

补齐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要根据乡村振兴与乡村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大趋势,可能需要重点在水基础设施布局、5G 网络等数字基础设施的超前布局、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社会设施现代化以及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②补齐不均衡不充分发展的“短板”。

① 陆益龙:《农民中国——后乡土社会与新农村建设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13 页。

② 顾朝林、曹根榕、顾江等:《中国面向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空间布局研究》,《经济地理》2020 年第 5 期,第 1—9 页。

表 1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状况(单位:%)

	全国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
有火车站的乡镇	8.6	7.6	8.3	7.7	18.0
通公路的村	99.3	99.9	99.5	98.3	99.7
通电的村	99.7	100.0	99.9	99.2	100.0
通宽带互联网的村	89.9	97.1	92.7	77.3	96.5
有电子商务配送站点的村	25.1	29.4	22.9	21.9	24.1
经过净化处理的自来水(住户)	47.7	62.3	43.9	38.2	36.1
有商品交易市场的乡镇	68.1	75.5	72.3	62.0	65.1
有体育场馆的乡镇	16.6	20.5	19.4	13.5	12.1
有本级政府创办的敬老院的乡镇	56.4	61.9	78.0	43.3	40.8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公报,2017 年。

对于那些刚摆脱绝对贫困的乡村地区来说,产业发展的滞后性与不充分问题是一块较为明显的"短板"。乡村产业发展的"短板"不仅关系到脱贫攻坚成果能否巩固和可持续,而且关涉新时代乡村振兴和现代化建设。在脱贫攻坚政策有力支持下实现脱贫的乡村,面临较为共性的问题是产业结构单一,即依赖于农业。在这些发展相对滞后的地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结构性问题比较突出。目前,尽管农业绿色水平、农业创新水平和农业共享水平对推动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农业协调水平和农业开放水平发展滞后仍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短板。① 因此,补齐乡村产业发展的"短板",实现新时代发展滞后地区的乡村产业兴旺,就需要从结构、协调和开放三个重要突破口发力。

首先,在结构方面,补齐乡村产业发展"短板"的主要方式是解决农业依赖以及农业结构单一问题。在社会快速转型的大背景下,以农业为主的农村经济结构显然难以满足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尤其难以满足农民增收的功能需要。农业内部也存在着结构单一和结构刚性的"短板",亦即一定区域内农业通常依赖于种植业,且种植结构较为单一,随市场需求变化而改变的弹性较小。

补齐乡村产业结构的"短板"不仅要改变农业的生产经营方式,而且还需要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进行突破,通过改革创新的推动力,促进乡村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与此同时,需要按照市场机制的原则,调整农业内部的结构,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提升农业生产经营的市场效益和经济效益。

其次,在协调方面,乡村产业发展的补齐"短板"需要重点围绕城乡统筹、产业融合的中心问题,为提升农业的协调水平开辟多种有效路径。乡村产业要实现均衡、充分的发展,就必须突破城乡二元经济的瓶颈。在城市与乡村之间,需要建立起一体化的、相互融合的体制机制,消除二元壁垒,提升资源和要素的流动水平与配置效率,以使乡村资源、乡村价值、乡村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出来,从而激发乡村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城乡统筹与融合发展机制也能利用现代城市发展的拉动作用和传导效应,迅速带动乡村的产业转型和产业发展。

在市场化、现代化转型的大环境下,农业发展显现出协调方面的问题,亦即农业适应现代市场社会需求的能力与机制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在发展相对滞后地区的农村,农业缺乏高附加值的内涵,经济效益较为低下。农民依靠农业实现收入增长的路径受到较大限制。因此,补齐乡村产业发展的"短板",还要提升农业与市场的协调水平,推动传统农业向高质量方向发展,提高欠发达地区农业的产业化水平,以及农业与第二、第三产业的融合发展。

此外,在乡村生产要素的开放方面,乡村产业发展的"短板"主要表现为土地、资金和技术的开放度有限。自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后,市场向农村劳动力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大量农民工可以流向

① 刘涛、李继霞、霍静娟:《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格局与影响因素》,《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0 年第 10 期,第 1—8 页。

城镇务工和经营,从而大大增加了乡村居民在农业外获得收入的机会。但受体制机制的影响,乡村对外的开放程度较为有限。农村土地流转、“资本下乡”、“技术下乡”等面临较多障碍和阻力,在较大程度上制约了乡村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发展。较低的开放程度实际上也限制了乡村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同时会约束乡村内生发展动力的更新与增强。补“短板”、扩大乡村开放,关键在深化改革。在农村土地制度方面仍须不断推进创新实践,在乡村市场体制机制方面深化改革,提升开放水平,让更多的新要素能够畅通地进入乡村社会,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新动能。

影响乡村均衡发展的又一块“短板”是乡村教育问题,这块“短板”常被遮蔽,或未受到足够重视。当前,乡村教育的“短板”问题突出地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乡村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二是乡村教育机会的不平衡;三是教育与乡村发展的相背离。在乡村人口大流动背景下,乡村教育资源配置面临着两难困境,一方面优质教育资源短缺,另一方面又出现教育资源有效需求不足,大量农村生源流向城市,乡村学校面临生少师多的不均衡格局。机会均等也是乡村教育发展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受体制及资源配置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乡村居民的教育机会获得实际上存在着不平衡问题。此外,在乡村转型与发展进程中,乡村学校的教育内容不仅越来越脱离乡村社会实际,而且越来越背离乡村社会发展需要。费孝通曾关注到并反思了 20 世纪 40 年代“损蚀冲洗下的乡土”问题,当时的教育不但没能胜任现代化的任务,反而让乡村的孩子再回不了乡村,从而产生“损蚀了乡土社会”的副作用。① 补齐乡村教育“短板”有着长远的、结构性的意义,没有乡村居民教育水平和人口素质的普遍提高,乡村乃至整个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将缺乏人力资源的基础。“补短板”的关键就是要解决乡村教育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问题,增加对乡村教育的投入,不断提升乡村教育的质量。

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之路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乡村发展的“主旋律”已发生历史性转变,因而在路径选择上需要调整。中国乡村幅员辽阔,区域差异性大,在发展路径选择上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和多样性原则,即各地乡村要根据各自自然、历史及社会文化的特点,选择多种多样、适当的发展路径与发展模式。然而,在路径选择的大方向上,则需要根据乡村发展的大势加以准确地把握。

从中国基本国情及乡村实际情况来看,从制度分析的视角来看,农村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后,在现代化的大背景下,乡村发展在路径选择上需要坚持走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之路。

首先,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乡村发展的战略重点,也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这一重要战略,并要求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目标,推进新时代的乡村发展。作为宏观制度安排,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乡村发展的大方向。

乡村振兴不仅是宏观政策的顶层设计,也是新时代乡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在现代化、城镇化推进的过程中,乡村社会的振兴是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基础。只有乡村社会得以振兴,才能巩固脱贫攻坚取得的发展成就,才能保障乡村社会持续发展,城市与乡村才会和谐共存。因此,乡村振兴的意义不仅在于推动乡村的发展,而且对于维持整个社会系统的多样性以及系统的协调运行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

新时代的乡村发展在路径选择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合理且有效的选择。在农村实现全面脱贫之后,一方面乡村具备了更为有利的振兴条件和基础,另一方面乡村也更需要进一步推进振兴措施。为满足广大乡村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乡村社会需要在产业发展、收入水平、居住环境和社会治理等方面实施振兴政策,以实现城乡、区域之间均衡发展,提升乡村社会的发展水平。

---

① 费孝通:《乡土重建》,长沙:岳麓书社 2012 年版,第 61 页。

乡村振兴是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充分发挥和调动广大农民群体的主体性与创造性非常重要,①因为只有在乡村主体认识到振兴乡村的价值,并积极参与到乡村振兴的实践之中,这样才能有效地推进乡村振兴。与此同时,乡村振兴的目标仅仅依靠乡村内部力量是无法实现的。与脱贫攻坚战略实施相似,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也需要国家主导的乡村建设力量的不断进入与增强。在工业化、信息化、现代化、城镇化的社会转型进程中,农业、农村和农民“三农”发展处于弱势地位,面临严峻挑战。乡村重建与乡村振兴在一定程度上离不开政府推行和实施具有扶持性、保护性和建设性的政策措施,为新发展格局下乡村发展注入和补充新的动力。此外,振兴乡村还需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功能。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进一步扩大乡村开放程度,让市场的力量助推乡村振兴。

进入新时代,乡村振兴还要与新型城镇化有机融合起来,共同推动乡村新发展。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并行不悖。新型城镇化体现出乡村和城镇多元化的发展路径,如李强等提出的“就地城镇化”,②还有乡村生活方式的城镇化,以及乡村集镇中心化、中心村、村庄新型社区化等路径。

乡村不完全等同于农村,乡村社会既包含农村的村落,也包括小城镇的县城、乡镇等社会构成。因此,乡村振兴包括小城镇的发展与振兴。在新时代,小城镇仍是费孝通所说的“大问题”。③ 因为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仍可以发挥小城镇发展对农村发展的促进作用。在推进农业结构转型升级、乡村产业发展、农民增收和生活条件改善等方面,发展小城镇都有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脱贫攻坚的过程中,一些特困地区农村的贫困户通过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在小城镇新型社区。这样,小城镇发展实际上又面临新的任务,亦即把反贫困或贫困治理与新型城镇化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加大小城镇建设与发展力度,拉动了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跨越式发展。

某种意义上,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的耦合点就在于大力发展小城镇之上。随着越来越多的县城、乡镇和集镇的兴起与繁荣,不仅会丰富城镇化的内容、提升城镇化水平,也会对乡村振兴和乡村社会现代化起到促进作用。所以,新型城镇化战略既要谋划大中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更要注重小城镇的发展。无论从城乡体制变迁的角度看,还是从苏南等东部发达地区乡村发展历史经验来看,小城镇发展既是破解“三农”问题困局的重要突破口,也是实现乡村社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有效路径。总之,有效地将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融合起来,形成驱动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两驾马车”,实现乡村发展动能及驱动方式的更新,更好地推动乡村振兴。

五、结　语

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总有时代特征,留下时代烙印。把握社会发展的未来走向,就要紧扣时代主题,前瞻时代大势。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来看,新中国乡村发展大体经历这样几个时代:一是新中国初期的小农经济时代;二是人民公社制下的集体化时代;三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开放时代;四是税费改革后的新农村建设时代。2020 年农村全部脱贫之后,乡村发展进入乡村振兴新时代。

迈入乡村振兴新时代,既是“三农”政策与国家制度安排取得阶段性成果的标志之一,也意味着乡村发展面临新课题、新机遇。正是在国家一系列强有力的惠农支农政策和精准扶贫措施的作用下,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乡村社会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变,乡村发展面临新任务。

乡村社会是社会系统的主体构成之一,乡村发展对于社会整体发展和协调运行来说,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乡村发展不仅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也是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而言,乡村发展的意义更为重要,因为只有在城镇化与乡村协同发展的

---

① 王春光:《乡村振兴中的农民主体性问题》,《中国乡村发现》2018 年第 4 期,第 47—53 页。

② 李强、陈宇琳、刘精明:《中国城镇化“推进模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2 年第 7 期,第 82—100 页。

③ 费孝通:《志在富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2 页。

前提下,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才能达到和谐均衡的格局。

乡村社会如何发展问题是一个永恒的议题。在新时代背景下,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中,如何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如何转变农村反贫困机制和策略,支持农村脆弱地区的均衡和充分发展;如何推进乡村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乡村发展水平,实现乡村社会现代化,这些都是新时代乡村发展需要破解的难题。

路径选择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对于乡村发展来说至关重要。探讨新时代乡村发展的路径选择问题,其意义并不局限于寻找一条理想化的、最优或最有效的具体路径,而是要正确把握乡村发展的大方向,明确乡村发展需要践行的合理原则及有效策略。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新征程中,乡村发展需要朝着现代化目标前进。尽管社会现代化是大趋势,但在推进乡村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合理、有效的路径选择须根据历史传统和现实情况探索出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亦即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对于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乡村社会来说,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既面临“补短板”问题,也面临如何推进高质量发展问题。对于存在较大差异性和多样性的乡村社会而言,路径选择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因地制宜,在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中摸索出适合自身发展需要的新路径。当然,乡村发展在路径选择上也要把握发展的大方向:那就是走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之路,走产业融合发展之路。

The Path Choice of China's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Lu Yilong

(*Center for Studies of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Method*,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With a complete victory in the battle against poverty in 2020, China realized her goal of building an all-round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Since then, China has entered into the New Era in her rural development. To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we must push forward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a comprehensive way and accelerat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on the basis of consolidating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so as to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the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The path choice of all-around rural revitalization must be made in the background and trend of modern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the reality of the rural society in China. We must integrate making up weak points with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rganically incorporate rural revitalization into new-type urbanization, form the "two carriage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which will promote China's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and steadily march forward on the road to China-style rural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development, path choice, China-style rural modernization

(责任编辑　刘曙光)